

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王琴¹, 伍达富¹, 母欢欢²

(1.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与设计系, 贵州 都匀 558022;

2.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大数据与电子商务系, 贵州 都匀 558022)

摘要: 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等对2010—2022年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协调程度进行探究。结果表明,2010—2022年,贵州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且两者间发展关系高度耦合,耦合协调度从0.3085不断上升至0.9378,发展态势良好。基于研究结果,从制定综合政策支持、加大资金投入、优化城市规划、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加强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措施建议,以期让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形成良性互动、实现耦合协调发展,从而推动贵州省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 熵权法; 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 F327; F299.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4)09-0195-06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1]提出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2]中再次强调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近年来,贵州省虽然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一是贵州省地处山区,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交通不便,资源相对贫乏,受到了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限制;二是贵州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缺乏支柱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导致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撑;三是贵州省存在劳动力流出问题,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给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如何吸引人才回流、提高人口素质问题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四是贵州省生态环境脆弱,土地石漠化、水土流失等问题显著,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存在,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尤为重要。所以,探讨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对推进贵州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还可为促进贵州省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近年来,学者们针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从多种视角开展了研究。在独立探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方面,赵杨等^[3]、朱艳娜等^[4]采用熵权法进行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指标测度;张焱等^[5]采取层次分析法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指标测度;陈登和王耀武^[6]采取因子分析法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指标测度。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方面,学者们探究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证实了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推动^[7-9]。因此,本文基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思路,以贵州省作为研究对象,建立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将评价指标带入耦合关联度模型中,进行2010—2022年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建设的耦合定量关系分析,以期为推进贵州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依据,与此同时也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指标体系构建

为更加准确和全面地反映贵州省新型城镇化

收稿日期: 2024-01-24

基金项目: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3GZGXRW066)

作者简介: 王琴(1995—),女,贵州毕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项目管理、经济管理、城镇化发展;伍达富(1993—),男,布依族,贵州安顺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城镇化发展;母欢欢(1993—),女,土家族,贵州铜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城镇化发展。

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十四五”国家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等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结合贵州省实际情况,参考借鉴张永东和杨子

生^[10]、韩秀丽等^[11]、徐雪和王永瑜^[12]、李汝资等^[13]的相关研究成果,按照科学性、可得性、全面性等原则,构建评价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决策层	单位	属性	权重
新型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0.032 6
		城镇登记失业率	%	负向	0.013 5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元	正向	0.031 0
		第二、第三产业占比	%	正向	0.028 0
		第二三产业产值/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万元/人	正向	0.021 1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城镇化率	%	正向	0.037 7
		城镇人口密度	人/km ²	正向	0.044 5
	社会城镇化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负向	0.032 6
		城市燃气普及率	%	正向	0.050 2
		城市用水普及率	%	正向	0.039 4
		城市每千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	张	正向	0.040 7
		城市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正向	0.049 9
	土地城镇化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km ²	正向	0.050 8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	m ²	正向	0.034 0
		城镇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m ²	正向	0.052 1
	生态城镇化	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 ²	正向	0.038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0.038 7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0.031 2
		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正向	0.018 4
		城镇每万人拥有公厕数	座	正向	0.086 1
		每万元 GDP 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负向	0.019 3
	文化城镇化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册	正向	0.036 9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m ²	正向	0.031 9
		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	人	正向	0.044 9
		公共图书馆个数	个	正向	0.040 5
		艺术表演场馆数	个	正向	0.055 9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	正向	0.039 8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 kW	正向	0.036 9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正向	0.080 5
	生态宜居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正向	0.028 8
		农用化肥施用量	万 t	负向	0.072 5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0.044 0
		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正向	0.065 2
	乡风文明	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占比	%	正向	0.048 0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消费支出	元/人	正向	0.067 1
		乡镇文化站数量	个	正向	0.029 9
		农村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	正向	0.050 7
		农村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	正向	0.051 4
	治理有效	农村基层组织村委会数	个	正向	0.056 0
		城乡收入差距系数	—	负向	0.043 2
		城乡消费差距系数	—	负向	0.036 5
		城乡恩格尔系数差距系数	—	负向	0.026 5
	生活富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0.052 2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负向	0.042 5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元	正向	0.054 9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m ²	正向	0.073 5	

1.2 指标数据来源

从 2011—2023 年的《贵州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选取贵州省 2010—2022 年的研究指标数据,在获取数据时,由于小部分指标数据有缺失,采用插值法和趋势法进行补齐,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无量纲标准化处理

由于构建的指标存在量纲、单位和属性的不同,在进行相关研究前,需通过数据无量纲标准化处理消除各指标间存在的差异,与此同时,为了消除数据标准化后数值过小或者负值影响测算结果,同步对数据进行平行处理^[14-15]。

正向指标:

$$b_{ij} = \frac{x_{ij} - \min x_{ij}}{\max x_{ij} - \min x_{ij}} + 0.000 1 \quad (1)$$

负向指标:

$$b_{ij} = \frac{\max x_{ij} - x_{ij}}{\max x_{ij} - \min x_{ij}} + 0.000 1 \quad (2)$$

式中: i 为年份; j 为具体指标; x_{ij} 为第 i 年第 j 个指标的原始值; b_{ij} 为第 i 年第 j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max x_{ij}$ 、 $\min x_{ij}$ 分别为第 j 个指标在研究时段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2 熵权法及综合发展评价模型

采取熵值法赋予评价指标相应的权重,使得评价结果更加真实可靠。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 计算第 j 项指标在第 i 年占该指标的总体比重 q_{ij} 。

$$q_{ij} = \frac{b_{ij}}{\sum_{i=1}^n b_{ij}} \quad (3)$$

式中: n 为测算年数。

(2) 计算第 j 项指标对应的熵值 e_j 。

$$e_j = \frac{\sum_{i=1}^n q_{ij} \ln q_{ij}}{\ln n} \quad (4)$$

(3) 计算第 j 项指标对应的熵权 ω_j 。

$$\omega_j = \frac{1 - e_j}{\sum_{j=1}^m (1 - e_j)} \quad (5)$$

式中: m 为测算指标数。

(4) 计算第 i 年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z_i 。

$$z_i = \sum_{j=1}^m \omega_j b_{ij} \quad (6)$$

2.3 耦合度模型

耦合概念来源于物理学,反映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模型为

$$C = \frac{2 \sqrt{U(x)R(x)}}{U(x) + R(x)} \quad (7)$$

式中: C 为耦合度,区间值为 $[0, 1]$,数值越大代表耦合度越高,反之亦然; $U(x)$ 为贵州省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 $R(x)$ 为贵州省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借鉴文献^[10],将耦合度划分为 4 个等级,见表 2。

表 2 耦合度等级划分

耦合度	耦合等级	耦合度	耦合等级
$0 < C \leq 0.3$	低度耦合	$0.5 < C \leq 0.8$	良好耦合
$0.3 < C \leq 0.5$	初级耦合	$0.8 < C \leq 1$	高度耦合

2.4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反映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整体协同强度。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D = \sqrt{CT}, T = \alpha U + \beta R \quad (8)$$

式中: D 为耦合协调度; T 为两个系统间综合发展指数。由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取系数 $\alpha = \beta = 0.5$ 。与此同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12,15-17],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10 个等级,见表 3。

表 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0 \leq D < 0.1$	极度失调	$0.5 \leq D < 0.6$	勉强协调
$0.1 \leq D < 0.2$	严重失调	$0.6 \leq D < 0.7$	初级协调
$0.2 \leq D < 0.3$	中度失调	$0.7 \leq D < 0.8$	中级协调
$0.3 \leq D < 0.4$	轻度失调	$0.8 \leq D < 0.9$	良好协调
$0.4 \leq D < 0.5$	濒临失调	$0.9 \leq D < 1.0$	优质协调

3 结果分析

3.1 贵州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分析

2010—2022 年,贵州省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图 1),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从 2010 年的 0.083 1 上升至 2022 年的 0.855 1,仅在 2012 年和 2018 年出现了轻微浮动,总体保持增长趋势。2022 年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是 2010 年的 10.29 倍。2020 年贵州省出台《提升城镇品质做强城镇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若干措施》,加速了贵州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有效推动贵州省新型城镇化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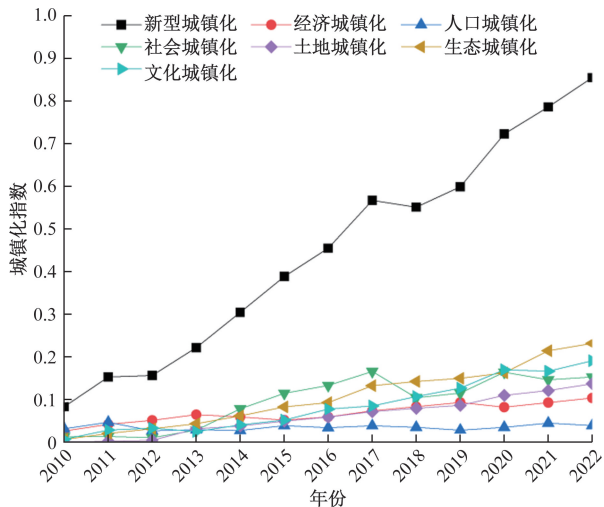


图1 2010—2022年贵州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

新型城镇化各个子系统看,2010年和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下降影响了整个新型城镇化的轻微波动。2018年开始,生态城镇化水平超过了所有子系统发展水平,这表明贵州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十分重视。2014年开始,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于其他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这说明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城镇化滞后,要注重农村人口转移与产业人口聚集同步。

3.2 贵州省乡村振兴水平分析

2010—2022年,贵州省的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图2),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从2010年的0.1096上升至2022年的0.9042,2022年的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是2010年的8.25倍,整体发展态势良好。贵州省在推动乡村振兴建设时,在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均得到了提升,其中乡风文明水平和生活富裕水平一直处于增长趋势。从乡村振兴各个子系统看,治理有效水平2020年后呈现下降趋势,这极可能是受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随着贵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完工,产业兴旺指数从2010年的0.0148上升至2022年的0.1390。

3.3 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3.3.1 耦合度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2010—2022年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均在0.98以上,甚至在2017年出现了耦合度的最高值1.0000,这表明贵州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发展始终处于高度耦合的状态。此外,还能发现两者间耦合度还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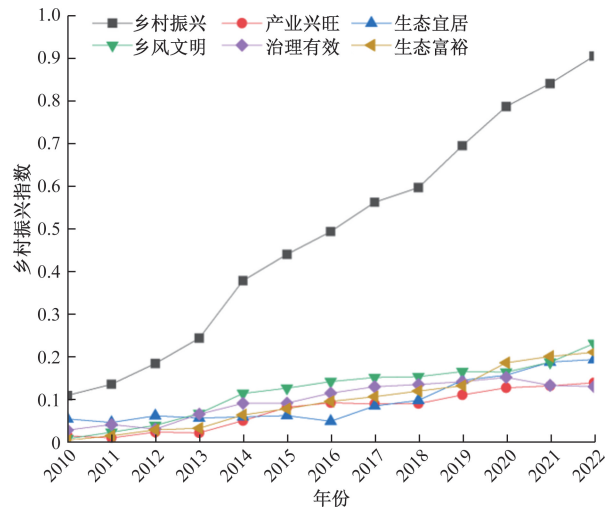


图2 2010—2022年贵州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

在小幅度的增减情况,这表明虽然贵州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发展高度耦合,但由于受某些因素影响和各个市州发展不均衡问题等也导致了耦合度波动的现象。

3.3.2 耦合协调度分析

2010—2022年贵州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始终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从2010年的0.3085上升至2022年的0.9378,发展态势良好,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从“轻度失调”阶段逐步上升到了“优质协调”阶段,达到了耦合优质水平。这说明经过13年的发展,贵州省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得到了优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乡村振兴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社会事务的改善,同时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人才和市场支撑。而新型城镇化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贵州省2010—2022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1)2010—2022年,贵州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从综合评价指数来看,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轻微滞后于乡村振兴的发展。

(2)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生活富裕、乡风文明和生态宜居水平得到逐步提升,成为影响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

表 4 2010—2022 年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

年份	综合发展指数		协调子类型	T	C	D	耦合协调等级
	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					
2010	0.083 1	0.109 6	新型城镇化滞后	0.096 4	0.987 5	0.308 5	轻度失调
2011	0.152 9	0.135 4	乡村振兴滞后	0.144 1	0.999 4	0.379 6	轻度失调
2012	0.156 6	0.184 2	新型城镇化滞后	0.170 4	0.998 3	0.412 4	濒临失调
2013	0.221 8	0.243 4	新型城镇化滞后	0.232 6	0.999 1	0.482 1	濒临失调
2014	0.304 5	0.378 2	新型城镇化滞后	0.341 3	0.993 1	0.582 2	勉强协调
2015	0.388 5	0.439 7	新型城镇化滞后	0.414 1	0.998 2	0.642 9	初级协调
2016	0.455 0	0.493 2	新型城镇化滞后	0.474 1	0.999 5	0.688 4	初级协调
2017	0.567 0	0.561 9	乡村振兴滞后	0.564 5	1.000 0	0.751 3	中级协调
2018	0.551 1	0.596 3	新型城镇化滞后	0.573 7	0.999 1	0.757 1	中级协调
2019	0.599 0	0.694 4	新型城镇化滞后	0.646 7	0.997 6	0.803 2	良好协调
2020	0.723 0	0.786 0	新型城镇化滞后	0.754 5	0.998 9	0.868 2	良好协调
2021	0.786 4	0.840 2	新型城镇化滞后	0.813 3	0.999 5	0.901 6	优质协调
2022	0.855 1	0.904 2	新型城镇化滞后	0.879 6	0.999 7	0.937 8	优质协调

生态城镇化、文化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水平逐渐提升,成为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趋于平缓。

(3)2010—2022年,在耦合度上,两者之间耦合度始终高于0.98,处于高度耦合状态,这表明贵州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之间高度依赖和渗透;在耦合协调度上,两者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从“轻度失调”阶段上升到了“优质协调”阶段,协调发展程度密切,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4.2 建议

(1)制定综合性政策支持。政府应制定一系列综合性政策,包括土地、产业、人才等政策,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持。政策应结合区域特点,要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增强农民创业创新能力、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等为目标,充分考虑乡村经济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收入等方面的需求,通过激励政策和扶持政策,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

(2)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大对贵州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资金投入力度。资金可以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提高乡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3)优化城市规划布局。在城市规划建设时,应始终注重科学性和先进性,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推动城市与农村的有机融合。要同时保持农村的绿色生态和传统文化特色,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此外,还需重点支持自主创新能力强和核心竞争力强的产业持续发展。

(4)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培训,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

能力。通过引导农民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农民专业技能等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产品质量。

(5)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交通网络,提高乡村电力供应和通信设施的覆盖率,改善农村供水和排水条件,提高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便利,提高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吸引人才流入乡村,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6)加强城乡融合发展。落实好城乡一体化政策,推动城市和乡村的互动交流,促进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城乡差距。通过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村居民进城购房等措施,实现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城市发展成果,增加城乡交流的渠道和机会,促进优势互补,推动城市和乡村的产业互补发展、城乡经济的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 (2018-02-04)[2023-06-15].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22-07-12)[2023-06-15].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7/12/content_5700632.htm.
- [3] 赵杨,王京,潘为华.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J].经济地理,2023,43(9):1-9.
- [4] 朱艳娜,何刚,张贵生,等.皖江示范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空间分异研究[J].安全与环境学报,2021,21(6):2865-2874.
- [5] 张焱,赵鸭桥,周铝,等.基于改进TOPSIS法的乡村振兴评价及地区比较[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

- (2): 207-217.
- [6] 陈登, 王耀武. 成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分析[J]. 城市学刊, 2022, 43(4): 64-70.
- [7] 郑洲.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实证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4(7): 105-114.
- [8] 刘双双, 段进军. 协调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内在机理、驱动机制和实践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11): 47-55.
- [9] 朱纪广, 侯智星, 李小建, 等. 中国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J]. 经济地理, 2022, 42(3): 200-209.
- [10] 张永东, 杨子生. 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J/OL]. 资源开发与市场, 1-18[2024-01-1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448.N.20231227.1806.015.html>.
- [11] 韩秀丽, 胡焯君, 马志云. 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11): 122-127.
- [12] 徐雪, 王永瑜.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5): 50-55.
- [13] 李汝资, 黄晓玲, 刘耀彬. 2010—2020年中国城镇化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3, 78(4): 777-791.
- [14] 王祖玉, 周冬梅, 张军, 等.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23(4): 1-6.
- [15] 马逸岚, 胡光伟, 冯海丽, 等.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J]. 河南科学, 2023, 41(4): 604-611.
- [16] 李艺宁, 龚心仪. 江苏省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耦合协调度及时空格局演变分析[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23(5): 41-45.
- [17] 陆远权, 张源. 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12): 85-89.

Research on the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WANG Qin¹, WU Dafu¹, MU Huanhuan²

(1.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and Design, Qiannan Polytechnic for Nationalities, Duyun 558022, Guizhou, China;

2. Department of Big Data and E-commerce, Qiannan Polytechnic for Nationalities, Duyun 558022, Guizhou,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 indicator system is constructed, and entropy weight method,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model, etc.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22.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0 to 2022,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showed an upward trend, and the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as highly coupled, with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from 0.308 5 to 0.937 8, indicating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uizhou Province's economy by forming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chieving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formulating comprehensive policy support, increasing capital investment, optimizing urban planning,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level, improving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strengthen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ntropy weighting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